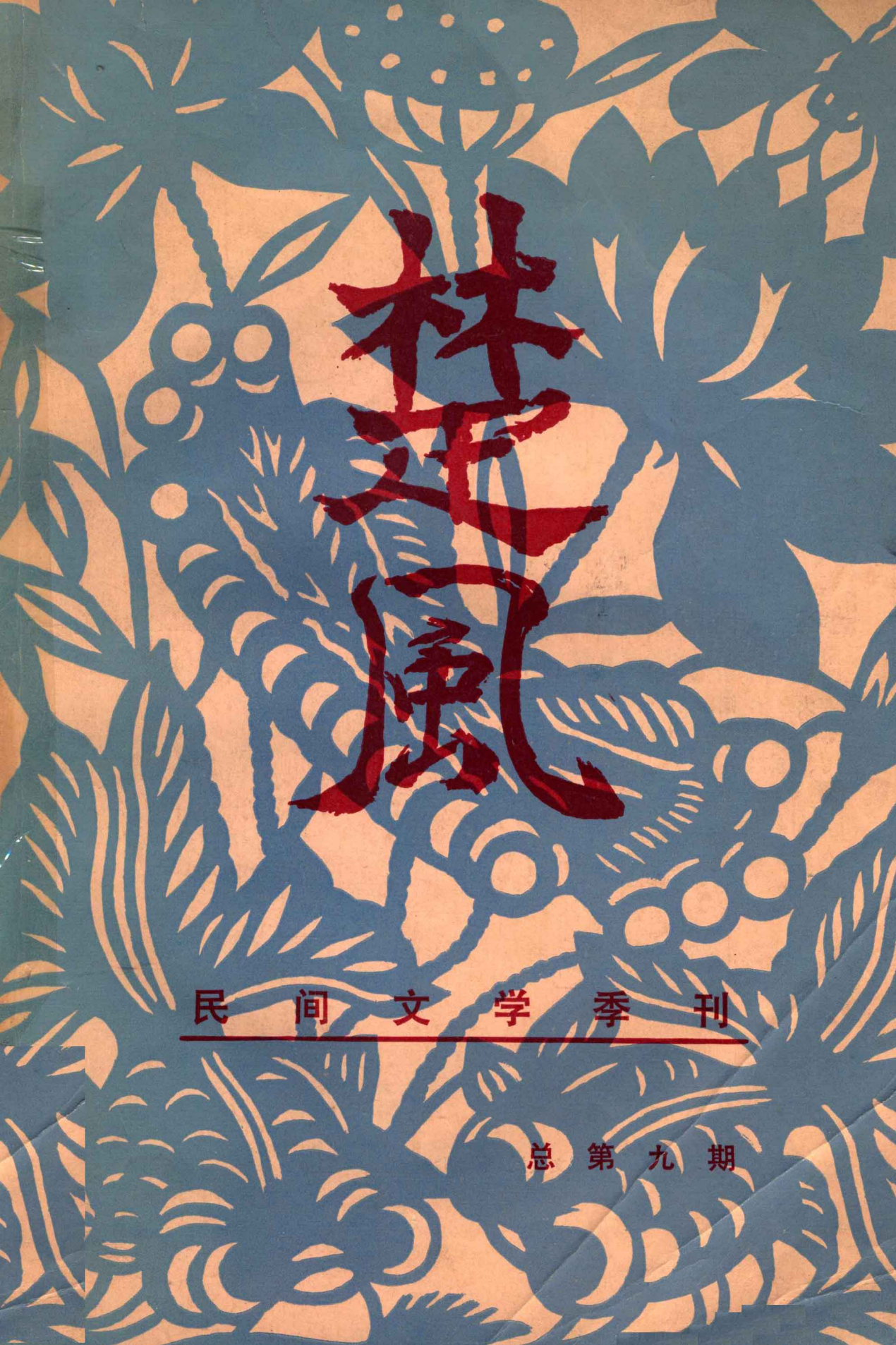




林 风

民 间 文 学 季 刊

总 第 九 期

楚風

目 录

1983年第3期

· 总第九期 ·

祝贺钟敬文同志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六十年特辑

- 我愿做培花的泥土.....钟敬文 (3)
- 探索民间文学六十年.....秦 牧 (6)
- 钟敬文先生在民间文学园地里.....许 钰 (7)

革 命 故 事

- 两次见到彭将军 (彭德怀同志故事)杨瑞生 梅友兰搜集整理 (11)
- 夜袭税务局 (贺龙同志故事)彭延烈搜集整理 (13)
- 坐“专车” (谢怀德烈士故事)刘元生搜集整理 (15)

心灵美传说

- 草鞋老板.....王伟搜集整理 (17)

家 庭 故 事

- 十个儿子不如一箱石子.....汤亚平搜集整理 (19)
- 多子何用!蒋礼荣搜集整理 (20)
- 五子争父.....林东搜集整理 (22)

新故事特辑

- 别把医生当“鬼”打.....胡铅搜集整理 (24)
- 抢亲.....杨甫明搜集整理 (26)
- 是钱亲还是义重.....黄伏秀搜集整理 (25)
- 不许开后门.....顺帆搜集整理 (24)

破除迷信故事

- 又做师公又做“鬼”.....胡 英搜集整理 (28)
- 三老光看八字.....何小琴搜集整理 (30)

机智人物故事特辑

- 满朝荐的故事.....黄民裕搜集整理 (31)
- 能干媳妇的故事.....熊传令搜集整理 (33)
- 李二木匠的故事.....贺宁安搜集整理 (34)
- 谎江山的故事.....刘自齐搜集整理 (36)
- 刘才师的故事.....刘德才搜集整理 (38)
- 王凡九的故事.....纪 鲁搜集整理 (40)
- 陈老五的故事.....邓学奎 徐菁搜集整理 (41)
- 石和尚的故事.....杨小龙搜集整理 (44)
- 老田的故事.....肖育群搜集整理 (45)

谚 语 故 事

- 王木匠料猪楼.....谭文波搜集整理 (47)
- 印老爷买皮丝烟.....梁真生搜集整理 (48)
- 一八一八的八.....孙再华搜集整理 (49)
- 圆觉半仙的哑谜.....熊艳彬搜集整理 (51)

屈 原 传 说

- 招屈亭.....何先义 何先培搜集整理 (50)
- 鹿鸣山.....范庆凡搜集整理 (51)

名演员故事

- 花中喜之死.....刘鹄华搜集整理 (53)

三 国 传 说

- 宝庆地名里的三国传说.....岳岩搜集整理 (55)
- 赵子龙和八角井.....刘典忠搜集整理 (57)

山 林 传 说

- 映花楠.....周志德搜集整理 (58)
- 背水鸡.....周志德搜集整理 (59)
- 松树砍了为什么不发茆.....张华成搜集整理 (61)
- 百宝箱.....李焕宁搜集整理 (61)
- 城墙岩.....李焕宁 王恒松搜集整理 (62)

地 名 传 说

- 平地一声雷.....张海泉搜集整理 (63)
- 纯阳村.....尹 吟搜集整理 (65)
- 金竹冲.....李桂香搜集整理 (66)
- 金牛洲.....张海泉搜集整理 (64)

笑 话

- 割耳朵·都来看、都未瞧·快嘴师傅.....陈金龙搜集整理 (67)

风 俗 志

- 黔阳的“酒歌”.....王建荣 (68)
- 祁东猎俗.....石达铮 (72)

乡 土 文 学

- 桃花源对联选注.....蒋 述辑注 (75)

民间文学工作者笔谈

- 一个故事的产生.....少 雄 (77)

民间文学研究

- 民间故事三谈.....屈育德 (79)

民 俗 研 究

- 从民俗学角度谈楚文化宝库的开采.....巫瑞书 (82)

国外民间文艺理论

- 民间文学概述.....青 乔译 (86)
- 动态.....(5) (18) (21) (23) (35) (46) (64)
- 题图·插图.....谢伦和 李劲松 康栗 李小兰

祝贺钟敬文同志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六十年特辑

八十寿怀 钟敬文

已是人间八十年

险途历尽见通津

儿时情事犹留影

早岁文章少恁心

举国辛同新蜀面

诗人尚绘锦乾坤

白颈不欺东隅失

要把袂巾饰暮春

癸亥年初夏于北京

我愿做培花的泥土

——三月二十日在政协北京市第六届委员会上的发言

钟敬文

我现在已经是足足八十岁的人了。

近年来，我总觉得今后能够切切实实地为社会主义祖国做点工作的时间委实不太多了。但是等待做的学术工作却是那么重要和那么多！我心里象火一样的迫切感是大家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我反复想，除了不顾一切、争分夺秒去干还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呢？

我是一个长期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教学的人。当年轻时候（那正是在被称作“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五四”文化运动之后），我就热心于搜集和探讨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学、艺术及风俗习惯。现在回顾起来，那种思想和活动，是跟当时我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民族意识醒觉和要求民主科学的巨大社会思潮密切相关的。

从那以后，我立下心愿，要为祖国建立这种新的人文科学（民间文艺学及民俗学）而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自二十年代中期到建国前夜的一段时期里，我的确曾经为实现这种早年的心愿而努力过。即使处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我也没有放弃这种冷门事业。但是，社会文化界对这种新学术不大重视，加上我个人在学术思想和方法上的缺点，因此，尽管始终坚持原有的志向，但成就是微末的。

全国解放，彻底地改变了许多传统的旧制度、旧观念。同时，也为许多提

高人民文化生活的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民间文学艺术,受到党和社会的重视,呈现了以前少见的活跃气象。在这方面建立了专门采集研究机构,刊行了专门杂志,印行了许多歌谣、故事集,发表了大量评论、研究的文章。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院校文科的科目中,列入了“民间文学”(人口口头创作),一些大学,还培养了这方面专业的研究生。当时,我在研究、教学和有关社会活动中,比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这是我从年轻时开始参与这门学术活动以来心情最愉快的时期,是我在学术思想上有较高造诣的时期。后者无疑地是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

但是,好景不常。从五七年开始,我国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经历了曲折,我个人的学术夙愿和努力也遭到严重阻抑。接着来的是“史无前例”的浩劫时期。它的结果是大家所熟知的也是我们今天所不忍细说的。最使人痛心的,是这种“革命”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摧残,至于个人所遭受的创伤是不足挂齿的。

1976年十月的一声霹雳,预告着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新的黎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三中全会扫荡了长达十年的黑暗阴霾,实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顿然海日东升,光明照耀大地。当整个国家社会恢复了元气的时候,与我血肉相关的民间文学事业也苏生了,并且接着以非常的速度前进着。更令人高兴的是民俗学这门学科地位的恢复。过去由于种种误解,这门近代新兴的人文科学,是在禁区里度过了将近三十年的寒冷岁月的。

这时候,我好象久困在小笼里的鸟儿,一旦破笼出来,飞翔在广阔明朗的太空中。这种喜悦的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劫难过去了,但人也老了。体力、眼力、精神,都不能跟少壮时相比了。而当前,我所从事的学术,虽然呈现一种葱茏景象,但它的根基并不太强固。学风有待进一步端正,队伍的质和量也有待提高和扩大。而学术资料的矿产还待大力挖掘,已经收获的资料,更有待于认真整理和研究。

总之,我们这方面的任务,是非常繁重的。客观要求和主观力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这种现实情况,要求我们迅速地,有计划地加倍努力地去应付它。为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尽一份力量。

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双肩上的责任!

近几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为了履行自己的责任,我竭尽力量,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在大学课堂上或学术界中,只要能够推进民间文学、民俗学这种学科的活动,我就不敢偷懒。现在这里略算一下流水账,向同志们汇报一点情况。

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两年间,我就参与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筹备恢复工作,同时为了使久被抹煞的民俗学复活,我草拟了请求建立这门科学及有关机构的建议书。它颇受到当时社会科学院领导的重视(该建议由顾颉刚、白寿彝和我等七位教授签名,后来稍加修订,公开发表于《民间文学》月刊,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九七八年秋,我应邀到兰州参加有数十个高等院校代表参加的“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选及学术讨论会”,并在该会和兰州大学作了关于刘三姐传说及孟姜女故事的学术报告。

一九七八年,教育部重新将民间文学列入高校文科科目。但因该科目久被停开,所以师资不足,教材缺乏,教师的业务水平也亟待提高。一九七九年春受教育部委托,我主持了高校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为期一年。我感到这是一个好机会,所以主动请准教育部利用教师集中和专业讲习之便,由我负责,大家一边学习,一边编写教材。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编成了《民间文学概论》的主要教材(约三十万字),及《民间文学作品选》的参考教材(二册,约六十万字)。这些教材,于一九八〇年秋季开学时,如期送到了开设这项科目的高校师生手里。这年夏,我还撰写了《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的现代学术史论文,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同年十一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开第二次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我发表了有针对性的《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的论文。

在这一年的暑假,我还主动举办了短期的民间文学讲习班,以便更广泛地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材。参加学习的约六十人,除高校教师外,还有文科研究所、地方出版社等的有关人员。在班上,我作了关于《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等学术讲演。同年秋天,我招收了六名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他们于去年毕业,都被授予了硕士学位)。

一九八〇年夏,我应云南大学的邀请,到昆明为该大学受教育部委托举办的民族文学进修班讲课,讲了《马克思神话见解蠡测》及《民间文学的搜集、记录》等专题。

一九八一年八月应邀赴丹东,参加辽宁省举办的民族民俗学讨论会,该省民俗学会成立大会,并

作关于民俗学问题的学术报告。本年春夏间，少数民族学会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分别在北京召开了学术讨论会。我作了《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等报告。

一九八二年夏间，在北京的民俗学同志，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筹备会，推我为主任委员，主持各项筹备工作。秋间新招了两名研究生。十月末赴宁波参加了浙江民俗学会成立大会及该省民间文艺第二次年会，我在大会上及归途经杭州、上海时，先后在杭州大学，上海民间文艺研究会作了关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演讲。

前不久，为了使现代关于劳动人民语言创作的理论史(科学史)得到比较全面的清理和科学阐明，我们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史研究小组，进行了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这种研究，已被列入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文学艺术学科的重点项目中。政协开会前夕我去桂林参加了有关的会议，并签订了议定书。最近才赶回来参加这次政协会议。

几年来，我前后写作并发表了十多篇关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文章，刊印了《民间文艺谈薮》、《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及《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等专著。又，我负责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民间文学”那部分文稿，经过几年来的计划、约稿、撰写，现在正接近于全部定稿阶段。这是一桩颇费力的工作。

以上把几年来个人的一些学术活动简单地作了汇报。粗听起来好象做了不少工作，其实不管从质或从量看，跟人民的要求都是相差很远的。就是这样一点点成绩，却受到我市党政负责同志的注意，给予了我以“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这除了使我十分惭愧之外，只有更加奋勉，以期不辜负人民的希望和自己的夙愿而已。

我近日时常深深感觉到，在我国今天这样大好的形势下，在我们的科学文化急迫需要迎头赶上的

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工作的人(或者勉强能够工作的人)，却不肯好好地为人、为祖国的进步而工作，那即使不说是犯罪，也是对社会缺乏应有的责任心的表现!

近来，有些同志见我年事已高，又碌碌不肯自休，“南征北战”任务满身。有的劝我尽量辞去那些职务，静下来整理整理过去的各种文稿(论文、散文及诗歌等)，有的劝我专心写作那准备已久而终未着笔的科学著作(《女娲考：从这个神话考察我国的原始社会史》)或回忆录之类。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整理过去的文稿，不管怎么说总是一种回顾的行动。在眼前正充满急待动手的工作，我不能放开它去回顾过去。放弃今天，就将失去明天!那将是多大的损失!而且，自己过去的东西，如果真有点用外，那将有后来的人(或同时代的年轻人)去整理、评定，不需要自己汲汲于此。至于写作那准备了多年的专著，是我所关心的。但是，我眼前的任务，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的。记得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讲话中，希望大家去做培花的泥土。这样可以使地上出现好花。这是伟大的教导!去年我在一个论文集序文的末尾说了下面意思的话：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一枝出墙的红杏。这和鲁迅先生谆谆教导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那些现实的而又神话般的英雄们，用他们崇高的品格和珍贵的劳绩凝成了时代的熊熊光焰，映照祖国和人民前进的大道。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时代的伟大气氛感染着我，英雄们的光焰照射着我。我抱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要把所放射的微光，融入时代英雄们的强光里去!

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责任!

· 动态 ·

中国民俗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分别举办讲习班

为了训练干部，培养更多的民俗工作者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及理论研究人才，发展我国民俗学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事业，中国民俗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于今年七月至八月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分别举办全国民俗学讲习班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讲习班。

这两个讲习班，都是两个学会成立后举办的首次讲习班，规模较大，时间都约为一个月左右。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讲习班除学习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基本知识、基础理论以外，还将旁听民俗学讲习班的有关课程。这两个学习班，我省都派了人参加。(边纪)

探索民间文学六十年

——祝贺钟敬文教授八十寿辰

秦 牧

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教授，是在世的最老资格的著名散文家之一，今年三月二十日，是他的八十寿辰。

文学界年轻的朋友可能不怎么普遍知道他，但是，四五十岁以上的文学工作者，一般对钟敬文却是很熟悉的。钟老是广东海丰人，新文学运动以来很有成就的散文家之一，同时又是民俗学者，民间文学研究家。从他青年时期，二十年代初参加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到现在，差不多有六十年的历史了。他现在是全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的副主席，北师大的一级教授。听说今年三月二十日，北京好些学人准备为钟老祝寿，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位卓越的民俗学者，探索民间文学长达六十年的研究家，在他年届八十之际，向他表示庆祝和慰问，是很有意思的。今年年初，我就给他寄发了一张贺年片，预祝他的寿辰了。

我认识钟老，已经四十多年。这段关系，回忆起来是很有趣的。那时，是抗战初期，我，一个年方二十岁的小伙子，在韶关一家报纸编副刊，可以说是个初出茅庐，很不懂事的青年。钟老，对于我来说，却是个社会知名的长辈学者。本来，我们是全不认识的。但是，大概是由于从我所编的副刊中，他认为我的倾向还不坏吧，竟先来探望我，当他踏进我的乱七八糟的住室，说出姓名来的时候，我不禁为之一震，因为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学者会主动来探望一个毛头小伙子，因而，内心是十分感激的。从这次“订交”以后，数十年间，在桂林、重庆、香港、北京等地，有机会的时候，我们都常常来往。他和我的关系在乎师友之间。我没有听过他讲课，不是正式的受业弟子，从不象许多同辈朋友那样，喊他“钟老师”，而是喊他为“散文同志”、“钟老”、“钟大哥”。但是，在中学念书的当儿，我就在补

充教材中学习过他写的散文，因而内心是把他尊为师长的。他来看我的那回事，甚至使我终生难忘，给我一番品德上的教育，使我对年轻人，也认真注意接待礼貌。钟老在心目中还是一位“恂恂长者”。

“长者”这个词儿，可不能单从字面来索解。单从字面看，年龄大就是“长者”了，但事实不然，正象小学生也在学，但我们并不称小学生为“学者”一样，对于某些年事虽高，但是品德、学养并不好，甚至毛病很多，“为老不尊”，老阿飞，老流氓等类人物，我认为和“长者”一词，丝毫不沾边。我们尊之为长者的人，是在品德、学识、素养、经验达到相当水平的人物。我们和这样的老人在一起，听他谈话，真个是“如坐春风”，他什么都可以告诉你，你也什么都可以告诉他，融融泄泄亲如一家。在我心目中，钟老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

和钟老多次接触，特别是七八、七九年，我长住北京两年，他进城时常来看我，我也常到北师大探望他；有时在他家吃饭，把黄药眠同志也找来，大家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谈，是十分心旷神怡的。这样的闲谈甚至比读书更有益。因为读三两个钟头的书，一般很难接触到这样丰富多采的内容。钟老由于研究民俗学、民间文学多年，对这方面的学识很丰富，简直是一部“活辞书”。三十年代，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向好些日本学者讲述这方面的问题，当时，年轻的增田涉也来听过。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现在的素养自然更可观了。从他写的关于孟姜女、刘三姐故事探源的论文，从他对鲁迅作品的研究，从他所写的许多古典诗词，以及翻译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一书，我们很可以见到钟老各方面素养的一斑。他的那个“一级教授”的职称，的确不是幸致的。怪不得在北师大中文系教师进行民主选举的时候，钟老以七十七八岁高龄，还给推选为

钟敬文先生在 民间文艺学园地

许 钰

(一)

我国现代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活动，从1918年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了六十五年的历史。在这六十五年中，这项事业经过曲折的道路，逐渐获得了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它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更是前所未有的。民间文学工作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兴旺发达的一部分，它之所以有今天，最根本的是由于党和人民的关怀和领导，由于广大专业和业余民间文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那些先驱者们的努力，在他们之中，钟敬文先生多年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工作，在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系主任。

从前，人们谈论钟老散文的时候，常说他“冲淡清隽”，郁达夫还说他的散文可继“冰心的后武”。实际上，“冲淡清隽”，只是钟老作品的一部分特点，另一方面，他又是热烈和深沉的。他把自己的书室称为“天风海涛室”。从这个词儿，可以想见他的襟怀。我觉得，真挚热情，和人民共哀乐，同脉搏，尤其是此老的特色。他写过一首七律《岁暮赠秦牧》给我，内容是这样的：

忆君近梓自西洲，万里风涛话壮游。

十载冰霜花事尽，一宵雷雨瘴氛收。

重光日月顺才笔，映雪襟期耻末流。

南海故人京洛客，明朝待泛载春舟。

一九七七年，他路过天安门时，写了一首即事

诗：

晴空仿佛降英灵，拂拂寒风想旆旌。

激激人流无隙地，簇云花束郁深情。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民间文学事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钟敬文先生的足迹。钟先生是广东海丰人，1903年3月20日生，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在故乡开始他的民间文学活动的。1922年12月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1924年钟先生就在“歌谣”周刊等刊物上发表关于歌谣、故事的短论和他采录的民间创作，参加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孟姜女传说的讨论。1927年秋，钟先生到广州中山大学工作，他和曾经在北京大学参与过歌谣研究会等活动的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一起（稍后还有杨成志等），成立了民俗学会，参加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等刊物，并出版了多种丛书。1928年夏钟先生到杭州，仍一边教书，一边继续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这期间他出版了关于民间文学的短论、

民心自是权衡主，鼠辈徒工鬼域经。

宁待史编钟董笔，眼中褒贬煞分明。

从这两首小诗，我想，人们很可以品味出作者真挚深沉的性格和爱憎强烈的感情。我认为：正是由于具有卓识，而又恬淡自处，钟老才能够在黑云乱翻，横逆扑面而来的那段日子里，沉静地继续研究学问，不断作出贡献。时间的浪潮淘洗了一切，当“徒工鬼域经”的纵横家和“鼠辈”们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时候，脸上被泼了污水的老实人终于以本来面目和世人相见了。

民间文学的研究，对于整理历史，发展人民文学事业，提倡文艺的民族风格，都是关系重大的事。在中国，难得有几个研究民间文学五六十年的，锲而不舍，卓有成就的人物。为钟老祝寿，不仅仅是对一位学者业绩的赞扬，我想，也该具有进一步推动民间文学研究的深长意义的吧！

随笔集《民间文艺丛话》(1928)、民间创作的记录《民间趣事》(1926)、《客音情歌集》(1927)、《蛋歌》(1928),他与杨成志合译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1928),写作了《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28,后于1930年出版单行本),此外他这时还写作了很多散文和新诗,这方面也出版了好几个集子。这是钟先生在新文艺创作和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初露头角的时期。

1930年四月底,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编辑的《民俗》周刊出至110期后停刊,这对当时的民俗、民间文学活动不能不是一个挫折。但是由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活动这时已有了十多年的历史,有了一批热心家,所以尽管中大这个南方民俗学运动大本营的工作发生一些曲折,整个运动并未因此一蹶不振。就任中大“民俗”停刊不久,1930年夏,钟先生和江绍原、钱南扬等,在杭州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出版《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一、二辑)等。钟先生自己也于这时及稍后几年间,写作了一系列较前更有深度的论文,如《中国民谭型式》(1933年被译成日文在日本《民俗学》月刊上发表)、《中国地方传说》、《关于植物起源神话》、《中国天鹅处女故事》、《金华斗牛风俗》(德国学术刊物上曾加以介绍)等等。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也反映在他于1932年发表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歌”中,这首歌说:“这儿是一所壮大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但现在啊,园丁不到,赏花人更是寂寥!斩除荆棘,修理枝条!来,同志们莫惜辛劳!‘收获’决不冷待了‘耕耘’,有一天她定要惊人地热闹!”^①

1934年钟先生去日本,在那里潜心深造,同时主编国内出版的《艺风》杂志上的“民俗园地”副刊和“民间文艺专号”等,并于此时在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老獾稚传说的产地》、《盘瓠神话的考察》、《中国古代民俗中的鼠》等论文,并向日本学术界介绍中国民俗学研究状况等,给彼邦学界留下深刻印象。1936年夏,钟先生回到杭州,在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教,同时担任国立艺术学院文艺导师,为“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民间风俗文化”等专号,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并出版了专刊,还编辑出版了《民间文化资料小丛书》,写作了《民众文艺之教育的意义》、《被闲却的民间艺术》等文,比较多地探讨了民间艺术及其和民众教育关系的问题。

自从参加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以后,钟先生逐渐把他的主要精力用到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上来,不断在这方面进行新的探索。他介绍和运用过比较

研究和欧洲故事型式分类法,学习过人类学派不同学者的理论,并运用这种理论探讨中国民间故事,在日本又接触了“文化传播论”和从多种角度研究神话的方法。后来,他感到这些理论和方法各有自己的缺欠,又努力吸收法国社会学派关于宗教和艺术的主张。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他逐渐认识到仅仅沿袭国外学者的理论和方法,远远不能适应研究中国丰富多彩的民俗、民间文学资源的要求,他觉得应该在我国建设独立而完备的民间文艺学。本来他在早年接触民间文学时,就对外国某些学者轻蔑中国神话、从而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文化创造和智力发展之类的主张,十分愤慨,经过多年的探讨与研究,他更从理论上认识到建设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必要性,找到了进行这项建设的科学依据。他在系统地提出这个问题之前,1934年底,在《艺风》杂志“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专号的前言中,就指出在我国建设这一群学问,在资料上占有很大的方便,并且认为:“我们的研究不一定只是欧罗巴或亚美利加学者们的研究的延长或扩大,结果许是它们(他们的成绩)的更根本的改进也未可知呢。”^②一年以后,1935年底,他写了《民间文艺学的建设》^③,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就这门学科的对象的特点、研究的必要与研究的方法等,概括地、系统地讲了他的主张和设想。自然,在这里他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这门学问的指导思想,但这是关于这门学科建设最初的拟议,随着时间和实践的发展,他终于弥补了早年这个重要的缺欠,并且大大发展了早年的主张。

早在三十年代初,钟先生就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和文艺理论等著作,但当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他的世界观和学术观点中占支配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后,钟先生到四战区政治部作宣传工作,改变了他过去的书斋生活,深入战地进行考察,比较切实地了解到时代的剧变和人民的现实生活,加上从这时起长时间同文化界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起工作,所以到四十年代中期更加自觉和认真地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因而后来再次到中山大学工作期间,1947年夏被国民党学校当局认为有“左倾思想”解除聘约,于是他去到香港,在那里的达德学院(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办的学校)任教,

① 《民俗学集镌》第二辑,1932年8月出版。

② 《前奏曲》,《艺风》二卷十二期,1934年12月出版。

③ 《艺风》四卷一期,1936年1月出版。

这时他的思想有了明显的变化。在香港,钟先生一边教书,一边作文艺工作,任中国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常委,方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写了不少有关方言文学的论文(其中多有涉及民间文学的内容),在《谈〈王贵与李香香〉——从民谣角度的考察》中,深刻总结了《王贵与李香香》学习民歌的经验和问题以及新文学创作吸取民间文学营养的意义。但这仅仅是一个新的开端,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还是在建国以后。

(二)

如上所述,在全国解放前,钟先生已经在民俗、民间文学方面工作了二十多年,在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和教授。但是建国以后,他并没有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仍是孜孜不倦地学习。近年来他常慨叹自己“平生闻道晚”,因而更加辛勤地工作,继续前进,为新时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事业尽力。

1949年5月,钟先生响应党的号召由香港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此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1950年他参加筹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历任民研会副理事长,参与全国民间文学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建国初他还和彭燕郊同志合编《光明日报》上的“民间文艺”副刊。

建国以来钟先生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有两个活跃时期,一个是建国之初的七、八年间。当时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开始当家做主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很多文章如《读了〈丰湾镰刀〉等以后》、《口头创作——一宗重大的文化财产》、《歌谣中的觉醒意识》等,都站在鲜明的人民的立场上,通过严密、踏实的理论分析,热情肯定民间文学的珍贵价值,宣传民间文学所表现的广大劳动群众的先进思想,从而把民间文学提到它应有的地位,在当时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民间文学研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时期他还为在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普遍开设民间文学课大声疾呼,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切实的工作,写了《高等学校应该设置“人民口头创作”课》,编选了《民间文艺新论集》等。这个时期他特别积极地学习了苏联的口头文学理论,热心组织翻译力量,专为《苏联口头文学概论》译本写了序文,联系过去国内外这方面流行的观点,学习苏联学者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处理民间创作理论中的一系列问题。这是他四十年代末思想发展在学术领域的继续,带有初步总结自己学术观点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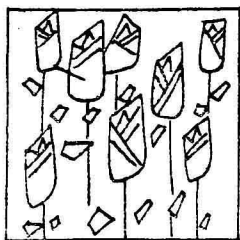
建国后钟先生学术活动另一个活跃时期是打倒“四人帮”以来当前这个新的历史时期。1976年钟先生已经是七十三岁的高龄,但是,经过十年浩劫,他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更加高涨,为发展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事业的劲头更大,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想法,而且由于年事已高,在事业上更加有一种迫切感。正如他这个时期写的一些旧体诗词中所说:“争分夺秒余生事,宁用回头叹逝川”,“要提精鼓勇,不计华颠。”在最近这六、七年里,他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恢复工作,并领导了会里许多重要活动;他联合几位老一辈民俗学家,倡议建设我国的民俗学,并积极筹建全国民俗学会。这几年他除了在北京出席市政协、文艺界、教育界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会议之外,还五次到外省市(兰州、昆明、辽宁、宁波、上海、桂林)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在北京师大校内,1979年他主持了民间文学进修班的同志们编写高校教材《民间文学概论》和供教学用的《民间文学作品选》的工作,暑期还主办了一个民间文学讲习班。在这一年他招收了六名民间文学研究生,他们现在已经毕业,全部获得硕士学位。最近他又和教研室的同志合招了两名研究生。1982年下半年他又对一期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作了许多指导工作。现在他正在组织几位同志进行“现代民间文艺学史”这一列为全国重点项目的科研工作,同时由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民间文学部分也即将完成。在这一系列工作进行的同时,几年内他除了写作许多民间文学短论外,还写作发表了《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为孟姜女冤案平反》、《刘三姐传说试论》、《“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等十多篇长篇论文,多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宣读,有的还被译成日文。近年来他还出版了《民间文艺谈数》、《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等书。

上述近年来钟先生的工作和学术成果,反映了他为发展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事业老当益壮的精神,同时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他在学术上不断前进的脚步。比如,早在抗日战争以前,他从日本回国后,曾多次探讨民间艺术同民众教育关系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他写作了《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展开》,阐述民间艺术在民族革命战争年代的作用;建国后他又不断考虑和研究民间文学在人民生活中的多种功能,以及民间文学作品整理、推广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逐渐形成他关于应用民间文艺学建设的主张。五十年代末,由于政治原因,他暂时被剥夺了上课

堂和发表文章的权利，他就进行晚清民间文艺学史资料的搜集和研究，于六十年代初写出《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等文，近年来又写了评价“五四”歌谣学运动、研究鲁迅在民间文艺学上的贡献和活动特点的论文，为近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作了开拓性工作。建国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记录和研究有很大发展，于是他结合这方面的新成果，在民族学、民俗学研究基础上，写作《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提出了这个重要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马列主义肆意践踏，1976年之后，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他特别强调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问题，近年来他更结合民间文学理论战线的历史和现状，在党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多次谈论应该从整体上认识民间文学本身固有的特点，把我们的民间文学理论建立在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实际的基础上，而不能搬用任何现成的公式和教条。为此，他在一些文章和讲课中不断回顾自己六十年来学术活动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建国初期学习苏联口头文学理论的得失。他指出，当时仅仅依据苏联学界把民间文学作为纯粹文艺创作看待，完全忽略从其它人文科学角度来研究、考察，这种情况很不利于民间文艺学的深入发展。他认为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它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于作家文学的特点（当然，在一些根本性质上，如反映生活、形象性等，它和作家文学也是共同的），因而我们要建立的文艺学也必须是一种特殊的民间文艺学。他说民俗学、民族学都是同民间文艺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民间文学工作者应该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和修养，为此他在1979年暑期讲习班上专门讲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问题。其他像学习马克思主义应注意以马、恩本人进行科学工作为榜样，要重视批判地吸收和改造前人和当前世界各国民间文学研究成果，关于民间文学资料科学建设和探讨方

法论问题等，也是他谈到民间文艺学建设时常常提到的。所有这些都是在多年研究基础上，密切联系我国民间文学工作的发展而提出的主张。这些主张同他解放前这方面的拟议相比，显然更加系统，更加丰富，根本观点也大不相同，但又在很多问题上是一脉相通的。他的这些主张除了上面引述过的文章中分别有所涉及外，在《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水平》、《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民间文学生涯六十年》（《民间文学论集》自序），以及1981年5月在民研会第一届年会上的报告《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及其研究方法》，1982年为师大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作的专题报告《民间文学特殊性及其研究科学》等文章和讲话中，都作了系统的阐述。最近在中国民研会第二届年会上他又就这个问题讲了《关于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提出我们应该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就有关各要点作了扼要的说明，指出了为达到这个目标应该努力去做的一些重要事项和应该树立的学风，进一步明确了民间文学工作的方向，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他的这个讲话的摘要将在《民间文学论坛》第三期上发表）。

钟先生有着多方面的成就，几十年来他写了大量的新文艺创作和作家研究等论文，出版过《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潮上散记》等散文集，1935年阿英编《现代十六家小品》，钟先生被列为其中的一家。他还出版过《海滨的二月》、《未来的春》等新诗集和旧诗《天风海涛室诗词钞》，出版过文艺短论《柳花集》和诗论集《诗心》以及《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鲁迅的印象》（翻译）等书。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方面，他六十年来坚持不懈，作了大量宣传、组织工作，撰写和编译了二十多本书籍和杂志的专刊，写作了论文、随笔等三百多篇，“成绩卓著，众所共仰”，实在是这块园地里十分难得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园丁！



两次见到彭将军

杨瑞生

搜集整理

梅友兰

编者按：这是流传在湘潭市小东门居委会和富潭公社富强、星火等大队以及湘潭县和平公社一带的一个传说。它的发生是有史实依据的，见《彭德怀自述》第18页至24页。但是由于群众口口相传，它已和史实有了很大的距离。不过我们从这个传说里，是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对彭总深切怀念的。

一

彭德怀在外县杀了个“吃私崽子不吐骨头”的恶霸地主，逃到了湘潭的易家湾垅里。这时，有一个名叫陈绍之的青年农民在薅草皮。他走近去，低声向陈绍之说：“老弟，后面有人要抓我，请你帮个忙好不好？”陈绍之忙问：“怎么个帮法呢？”彭德怀说：“把你的青衣服借给我罩在身上吧！”陈绍之二话没说，将自己的罩衣脱下，连同自己的草帽，一起交给彭德怀。他们两个一齐下到水田里，走到田中间，用锄头和扁担当作蹠田棒，假装在蹠田。

不一会，几个丘八老爷端着枪跑来了。他们粗声粗气地吼：“你们看到个穿蓝衣的年轻后生子从这里经过吗？”陈绍之把手一指，回答说：“看到了。他从那边打飞脚向易家湾

街上跑去了！”

丘八老爷走远了。陈绍之轻声地笑骂着：“瞎了眼的东西，让他们到扬州去找没姓人吧！”他邀彭德怀到自己家去躲一躲。在路上，他问清了彭德怀的姓名和来历，不住嘴地称赞彭德怀是英雄好汉。回到家里，对家里人和邻舍们说，这是去年和自己一起做过长工的伙计。

陈绍之住的地方叫严家屋场。彭德怀在陈家吃了晚饭，由陈绍之划着小船，当晚送过湘江，到了跑马坪李桂生家里。李桂生全家都很敬重他。这里的地方团保排甲也在搜查彭德怀，李桂生要他住在楼上，每天给他送茶送水送饭菜。有一天，彭德怀下了楼，告诉李桂生，要到外县去活动。忽然听到外面狗叫，两人偷眼望去，只见约有一个班的丘八老爷，开进跑马坪一带来了。李桂生见这地方也不保险，就叫彭德怀蜷缩着躺在土车箩里，盖上一床蓝土布印花被单，上面倒上大半箩米，把土车子推出了瓦屋坪，在路上虽然也碰上了几次丘八老爷，但是这些杂种们都象鬼蒙了眼，谁也没看出土车子里藏了人。

李桂生推着土车子，坐渡船过了湘江，到了严家屋场。当晚，由他和陈绍之两人护送，抄没有岗哨的小路，离开了易家湾。

这真是：“穷帮穷来富帮富，烂草鞋帮破衣裤。”彭德怀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脱了险。

二

一九五〇年，湘潭小东门喜庆堂鱼苗公会里来了个税局干部，要渔民们缴纳税款。渔民们说：“小东门，不作田，靠着四月吃一年。捕捞、养殖、买卖鱼苗，是望天收的季节性生产，这个税不好缴。清颡子、国民党时代，都没缴过税呢！”几个为头的一商议，决定去找李桂生，请他到北京去见见彭总，求个情，免了鱼苗税。李桂生一口焦干答应了，渔民们凑了点路费给他，他就真的进了



京。

李桂生对彭总门口的警卫员说明，自己是湘潭的李桂生，是来看老朋友彭元帅的。警卫员进去报告了彭总，回头告诉李桂生说：“老总这几天不闲，请您到宾馆去住几天，再抽个时间接见您。”便派人把他送到了宾馆。

过了几天，李桂生又去找彭总。这次，彭总接见了。寒暄了几句之后，彭总单刀直入地问李桂生的来意。李桂生不好意思直说，便说自己想参加革命，来找个工作做，附带替小东门的渔民来请求免税。彭总详细问了鱼苗的生产情况，李桂生把鱼苗不缴税

的历史，絮絮叨叨地告诉了彭总。他说：

“明朝初年起，鱼苗船因救过朱洪武，不但不派差撈船，而且免了鱼苗税。清朝按明朝旧例，也不收税。国民党派人来收税，渔民们说‘乡下种田的只交谷米税，不交秧苗税；滴水埠熬盐的只交盐税，不交盐水税；打鱼的交了鱼税，没有再交鱼苗税的道理。’也就不收税了……”

彭总和蔼地对李桂生说：“你提出的两个要求，我就当面答复你吧：你要参加革命，很好；现在农村里要实行土地改革了，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你回家去积极地投入这场大革命运动，去发挥作用吧！分得了田地，要努力生产，支援国家。我给你点钱去做生产资料的本钱，以后，我每年还寄点钱给你，你留个通讯处吧！”说罢，他拿出一百万元旧币，给了李桂生。

彭总接着又说：“鱼苗税的事，我去通知你们湘潭县委，就按习惯办好了。不过，地方上的事，人民政府是会合理解决的。你以后不要再帮人家搞‘越级上告’了。”他见李桂生穿的较单薄，就从身上脱下黄呢大衣，赠给了李桂生。

李桂生还没到家，税局干部就再也不到喜庆堂鱼苗公会来了。李桂生到家后，常对别人说：“这号元帅哪里有？官大不忘穷朋友。”他还常常将军大衣披在身上，见人就说是彭元帅送的。

（谢伦和插图）

夜袭税务局

彭延烈

搜集整理

一九三九年九月初的一个傍晚，由桑植往龙山的大道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商队，四个挑伏，两个随从，跟在一个商行老板后面。商行老板头戴博士帽，留着八字须，一副墨镜搁在鼻梁上，穿着长衫，拄着文明棍，确实有些神气。

一个过路的老头子私下议论说，“天都快黑了，他们不怕土匪吗？”

“老伯伯，前面有土匪吗？多少人？”

老头子一看这老板样子有点象金刚菩萨，讲话却这样和和气气，就诚心地说：“土匪听说红军要来，早爬山了，就是前面税务局要钱，怕不会轻易放你过身。”

一个青年人补充道：“人家都讲贺龙来无影，去无踪，土匪听到手脚发软，哪敢在寨上停留！连税务局这几天也不等天黑就关了门，说是红军便衣队专门摸‘夜螺蛳’。”

老板整了整博士帽，说了声“多谢”，棍子向前一摆，随从、挑伏们就跟着老板向寨子上奔去。

茨岩税务局长龙占标，人们都叫他“龙长膘”。自从他担任这个要职后，纠合了一班打手充当乡丁，搜刮民脂民膏。这几天他也有些提心吊胆，怕红军来了保不住命，但又舍不得丢掉这个肥差使，就硬着头皮呆在税务局里，叫喽罗们早关门，迟开门。他想：大白天红军要来，总会有点风声罢！若晚上来，我就躲在碉堡里固守，县城里听到枪声准会来人救援的。

这天傍晚，龙长膘把胖脑袋往枪眼里一探，说声“没有旅客了，关门”，然后就和他的婊子婆抽大烟去了。

大路上，那支小商队穿进茨岩乡场，先到饭铺里把担子一放，就叫“来饭来水”。哪知这个饭店主人是有来头的，名叫陈寿昌，外号陈豇豆，是龙长膘的把兄弟。他看到来客抖派头，心里老不高兴，就漫不经心地说：“上了税吗？”“吃了饭上税，也不迟嘛！”商队中一个随从顶着说。

“我这儿不是税务局。但我们按上司规定，不接待没上税的客商。”饭铺老板忍着气解释说。

“我们老板和税务局长有交情，吃了饭，烦你通个信。”商队中的一个挑伏抢着说。

这一下可惹火了饭铺老板，你看，他跳出帐房，撩起衣袖，伸出一双枯瘦的手向挑伏脸上扇了过来，嘴里哼道——“先给你通个信！”

说时迟，那时快，挑伏一闪身，用脚轻轻一勾，饭铺老板早扑在地上了。另一个挑伏一脚踏在饭铺老板的背上，立即用汗巾塞住他的嘴，把他捆成一个粽粑。饭铺伙计吓得目瞪口呆，老板娘听到外面有响动，出来一看，外面六支枪对着众人，丈夫被捆在那里，吓得象一摊泥，动弹不得。挑伏们把他两口子绑在一起，

系在石条凳上。这两个家伙，一个眉皱眼歪流冷汗，一个呲牙裂嘴直哼哼。商行老板挂起文明棍，走出店来，两个随从留着看守这两条“猪”，四个挑伏四挑担子在后面跟着，直闯税务局。

天色已近麻麻黑，弯钩似的月儿挂在西天，商行老板和四个挑伏转了个两拐，上了一道阶梯，来到一座石砌碉堡门口。

商行老板用文明棍敲门：“嗒嗒嗒，嗒嗒嗒……”碉堡上的乡丁们一怔，有的悄声惊呼：“红军——”有的两手按住炮眼打算窜下碉堡逃命。乡队副提起短枪高呼：“别动！”乡丁们才一个个呆立在那里。这一声惊动了龙长膘，这个鸦片鬼从鼻子里哼了句：“碰着什么鬼了？”乡队副报告说：“外面有人敲门！”龙长膘刷地一下从床上翻了起来，拖着鞋子“辟里拍啦”跑下楼梯，看见这班子草包的惊恐样子，心里也不免发起慌来。足足过了一袋烟的工夫，乡队副自告奋勇地说：“报告局长，我去看看。”龙长膘用袖子往脸上一擦，袖子湿了一大块，口里却说：“都是裤裆包的！”乡队副推了两个乡丁走在前面，自己战战兢兢地跟着到来门前。“嗒嗒”敲门的响声仍然不轻不重，不急不慢。还有人在喊：“上税！上税啦！”听到是上税的，乡丁们来精神了，打着官腔骂道：“妈的，天都黑了，为什么不早来？你们是不是红军的探子？”外面的又说道：“天黑了不方便，我们就明天来。”乡队副一听，觉得上钩的鱼儿溜走太可惜，就抢先一步开了门，冲出来吼道：“缴税是做生意的义务，挨到天黑才来，已经失礼，还要往明天推？”说着踢了踢巴篓，问道：“装的什么东西？”

“岩盐。”商行老板从容不迫地回答。

乡队副打量着这位客商相貌不凡，衣着阔绰，想捞点油水，紧逼一句：“上面装的锅巴盐，下面装的大烟！”

“老兄，这几年红军来来往往，又加上税所的检查严格，哪个敢带烟土！”

“说的好听！”乡队副要动手揭巴篓。

客商忙压住巴篓说：“请长官报告一声，我和龙局长是老交情。”

“有请龙局长——”一听是龙局长的老交情，乡丁早就吆喝开了。

龙长膘骂骂咧咧地从楼上走下来：“她娘的，胆小鬼，来个上税的也慌了手脚，什么事都离不开我！”

龙长膘打着官腔，走出堡门。客商迎了上来，老相识一般地说：“龙局长，去年我们到来凤城里就说过，今年九月来拜访，今天算是守信用了啰。”

龙长膘有些莫明其妙。乡副队显得殷勤起来。乡丁打算收兵回堡。

还是龙长膘冷静，走到客商面前，想认出个究竟。挑伏马上揭开巴篓盖，说：“请龙局长过目！”

龙长膘弯腰一看，巴篓里全是河里的圆石头，正要发作，不料刚直起身，客商的短枪早已顶住了胸口。乡丁早被挑伏缴了械。乡队副正往身上摸，被近边的挑伏一腿打翻在地，缴了枪。客商与一个挑伏，两支枪对着四人，一个挑伏守住堡门，另两个挑伏冲上楼说：“缴枪不杀，我们是红军，贺龙来啦！”

乡丁们听这一喊，一个个动弹不得，被挑伏们下了枪栓，赶下楼来。

与此同时，自桑植往龙山的大路上，一支威风凛凛的部队向茨岩乡场挺进。尖兵连已经控制了山头要道。一位身材高大，背着竹叶斗笠，留着八字须，穿着灰色军装的军人和几个红军战士来到税务局门口。商行老板摘掉墨镜，揭去博士帽，丢下文明棍，一个立正：“报告贺军长，我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活捉龙占标，俘虏陈寿昌和全部乡丁。”

第二天，茨岩乡场上贴着严惩吸血鬼龙占标的布告，下面落着“红三军军长贺龙”几个大字，象降妖魔的符箓一样，使得吸血鬼缩在家里不敢动弹。乡场的烟子行边倒着龙长膘的尸体。

坐“专车”

——谢怀德烈士故事

刘元生 搜集整理

民国元年，从水口山到松柏，修筑了一条小铁路。这条小铁路把工人们肩膀上的担子揽下来，把水口山出产的铅锌矿砂装进大斗桶里，拖到湘江河边，再转水路运往长沙、武汉，然后出洋。

自从有了这条小铁路以后，矿局的局长、高级职员由水口山到松柏，或由松柏回水口山，再也不用坐前清时代留下的那顶绿呢轿子了。他们制作了一辆车厢，外面漆得油光鲜亮，内里摆着沙发，挂上金丝绒窗幔，板壁上镶嵌着铜框西洋堆彩画，象一间精致的西式小客厅。每当局长、高级职员外出办事或返回矿局，只要通知站房一声，这节车厢就亮煌煌地挂在车尾上。

一天，谢怀德因公事到了松柏，正要走路回水口山，只见站台上停着那辆“专车”，一问，才知道是来接局长刘世涛的。谢怀德招呼跟他同行的工人们说：“走，坐车去！”

工人说：“那是局长坐的，你看，还有背‘猪脚棒棒’的守着车门口呢。”

谢怀德指着工人們的赤脚板子说：“我们成年累月在这十多里山路上磨脚板皮，今天不坐上这趟车，想起来都对不起它们。跟我

走吧！”

工人们还是犹豫着，从铁路修成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谁也没有想着去和局长大人平起平坐，就是走拢去看一眼，还要遭背猪脚棒棒的护兵责骂，历来尊卑不合套，是什么菩萨享什么供，哪个敢去惹祸？反正走路也不会走大脚。有些工人走了。

谢怀德步子雄健地向车厢走去，背“猪脚棒棒”的瞪着一对阴冷的眼珠子瞪着他，他穿着黑粗呢大衣，戴着礼帽，手里还提着根文明棍，一个神气万担的黑大汉。护兵客气地问：“先生要——上车吗？”

谢怀德一只手攀着车门扶手，点点头。

护兵横膀拦着车门说：“先生什么人？”

“工人！”

护兵上下又打量了一眼谢怀德，看手脚，是个下力的；看衣着，又象——象个什么呢？绅不绅，民不民。护兵把身子斜成根门扛，顶着车门说：“这是局长专车，平常人哪有这号福气？走路吧，要么喊两个脚力，抬上山去。”

谢怀德的双脚踏上踏板，说：“不想走，也不想坐轿，就想坐局长的专车！”

护兵动了火，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晓得方圆，要是你能坐，这世界还能成个体统！”

“哼，我不能坐？告诉你，就是这个世界我们工人也能坐，站开点！”

护兵还没见过这么大口气的工人，长期养成的职业本能，使他发起威来，他从腰上拔出“猪脚棒棒”，退后一步，张着机头对着谢怀德说：“下去，不然叫你车坐不成，命也活不成！”

谢怀德的猛劲被惹发了，他横过文明棍，将护兵的“猪脚棒棒”望上一挑，一蹬腿上了车厢：“我这文明棍也有点不文明噢！”

工人们唯恐谢怀德吃亏，早就不前不后地跟着他，见护兵真的动开了家伙，一齐发起喊来：“他是我们俱乐部的纠察队长，谁敢动手！”一边喊，一边将车厢围住。

这喊声比响枪还有杀气，护兵一听是工

人纠察队的队长，顶在车棚上的枪收也不是，打也不是，眼睛直勾勾地向站房那边望着。

局长刘世涛在站房休息室里听得外面吵嚷，慢慢地步了出来，见一个穿黑大衣的堵在车门口，凭背影他就认出了谢德怀，急忙走过去，用地道的新宁土话问道：“谢队长，要上山吗？”

谢怀德一听刘世涛的声音，转过脸来，揶揄地说：“呀呀，要不是你来得快，我这一百多斤差点被你的护兵送上山了！”

刘世涛钻进车厢里，对护兵喝道：“黄了眼啦，连谢队长也不认识！”

护兵“叭”地立正：“报告局长，不认识。”“还不赔礼道歉！”

护兵把“猪脚棒棒”插进套子里，把手举到帽沿边说：“向谢队长致敬！”

谢怀德说：“不打不相识，看来这车子坐得成了？”

刘世涛挥退护兵，客客气气地对谢怀德说：“请坐，请！”

谢怀德也不谦让，一屁股坐进沙发里，说：“这是局长的专车，我，一个打铁的工人也坐得？”

刘世涛忙说：“说哪里话，劳资一家，坐得坐得。”

谢怀德站起来，走出车厢，招呼站在轨道边、站台上的工人们说：“上水口山的，快到这里来坐车，刘局长同意了呢！”

工人们一听说局长同意了，蜂涌而来，谢怀德站在车门边，一个个往里让，嘴里不住声地说：“请进，请进，车上有座位，随便坐。”

刘世涛一见钻进来这么多工人，皱起了眉头，他觉得空气中的平等气味太浓厚了。

你看那些工人，用砂岩一样粗糙的手，摸沙发，搓金丝绒窗幔，有的还用指头蘸了口水去摸西洋彩油画，看脱不脱色。他们吸着十分呛人的老叶子旱烟，大声地说笑着。

谢彭怀等大家都上了车，才钻进车厢来，他见刘世涛那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便说：“刘局长，你方才不是说劳资一家吗，他们跟我一样，有打铁的，有司泵的，也有拖篓子、放洋炮的，都坐得呀！”

刘世涛被谢怀德这个“死猛子”钻了空子，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坐得，坐得！”

谢怀德转脸对工人们说：“大家都听到了吧，局长说了，这车局长坐得，我们工人也坐得。大家以后就不要讲客气，有车只管坐，局长，你说是吧？”

刘世涛点点头，没有出声。

小火车头“呜——！”地一声长鸣，象是一条牛崽崽的叫声。接着又是一声长鸣，车开了。

谢怀德见几个老工人在车上站得摇摇晃晃的，就对坐在沙发上的护兵和几个年轻职员说：“你们年青，骨头嫩，站一会好不好，把位置让出来给几位老工友坐，别让火车把他们的身架子摇散了！”

工人们哄笑起来，护兵和职员们看了刘世涛一眼，见他不吭声，便不情愿地站起身，把身子斜倚在车厢板壁上。谢怀德把几位年纪大的工人让进沙发里，一位老工友笑眯眯地说：“这椅子真软，今天我们象坐了龙廷了！”

车，隆隆地响着，它碾碎了一些不平等的制度，带着老叶子旱烟的呛人气味和粗犷的笑声，奔驰在矿区的原野上……

